

# 金代的女真人与儒家思想文化

刘 辉<sup>1,2</sup>

- (1. 吉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 吉林 四平 136000;  
2.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与文化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33)

**[摘要]** 金建国伊始,即确定儒学为国家意识形态,儒学是统治者“致治”的指导思想,金代的女真教育与科举皆以儒学为主要内容,女真人伦理观念表现出明显的儒学化倾向。但女真人对儒学的学术研究还停留于较浅的层面,他们对儒家思想本身的思考,主要集中于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道德层面,对于形上层面和本体层面、心性层面的内容甚少涉及。

**[关键词]** 金代;女真人;儒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4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01(2013)03-0101-05

金朝(1115—1234)是女真族建立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金建国伊始,即确定儒学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儒术治国在金代贯彻始终。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儒学在金代的承载者和接续者主要是汉族学者,金代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和绝大多数儒家学者都是汉人。但是儒学作为一种文化和观念,尤其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金建国伊始,即受到女真人的接受、吸纳和有效运用。作为金朝的主体民族,女真人对儒家文化的学习、接受和研习,是金代历史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加强此内容研究,对于保持中国儒学史研究的完整性、对于金代思想文化研究的深化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 一、儒学是统治者“致治”的指导思想

《金史》载,熙宗曰:“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sup>[1]卷46《熙宗本纪》,77</sup> 大定二十六年,世宗也尝谓侍臣曰:“朕于圣经不能深解,至于史传,开卷辄有所益。每见善人不忘忠孝,检身廉洁,皆出天性。至于常人多喜为非,有天下者苟无以惩之,何由致治。”<sup>[1]卷8《世宗本纪下》,195</sup> 熙宗和世宗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致治”的想法。金绌辽灭

宋建立其政治统治之后,历代统治者励精图治,追求“致治”成为他们共同的理想和政治目标。自熙宗始,金历代帝王皆受到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有着较高的儒学修养,儒家哲学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政治哲学智慧,成为他们“致治”的指导思想。

其一,以德为本。儒家政治哲学倡导德刑兼治以德为主。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sup>[2]《论语·为政》</sup> 严刑峻法只能起到治标的的作用,只有施之以教化,导民向善,才能达到治本的目的,真正建立起稳固和谐的社会政治秩序。世宗提出“天下大器归于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之,但务修德,余何足虑”<sup>[1]卷7《世宗本纪中》,157</sup>。他用人赞同“德器为上,才美为下”<sup>[1]卷99《徒单穆传》,2185</sup>,又说“人之有干能,固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最优也”<sup>[1]卷8《世宗本纪下》,193</sup>。章宗对“今之察举,皆先才而后德”的现状表示不满,提倡“官吏有能务行德化者,擢而用之”<sup>[1]卷10《宣宗本纪二》,227</sup>。尚书省奏报升迁大兴主簿蒙括蛮都,宣宗说“蛮都浇浮人也,升之可乎?与其任浇浮,孰若用淳厚。况蛮都常才,才如过人犹不当用,恐败风俗,况常才

**[收稿日期]** 2012-12-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ZX042)。

**[作者简介]** 刘辉(1968—),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耶”<sup>[1]</sup>卷10《章宗本纪二》，233。儒家以民为本思想也得到了金代统治阶级的认同。世宗尝谓臣下说：“昨夕苦暑，朕通宵不寐，因念小民比屋卑隘，何以安处”<sup>[1]</sup>卷8《世宗本纪下》，184，爱民忧民之心溢于言表。《章宗本纪》也有多处关于章宗体恤臣下关心百姓疾苦的记载。如，泰和三年，章宗宴四品以上官员，因“天气方暑”，“命兵士甲者释之”，又尝“喻省司，官中所用物，如民间难得，勿强市之”<sup>[1]</sup>卷11《章宗本纪三》，260。就连海陵王也说过，“国家吉凶，在德不在地”<sup>[1]</sup>卷5《海陵本纪》，97。

其二，善于纳谏。中国历史上历代有道明君，莫不广开言路，虚心纳谏，诸葛亮劝刘禅亲贤臣远小人。唐太宗任用直谏之臣魏征成为一代佳话。金世宗明确表示：“朕常慕古之帝王，虚心受谏。卿等有言即言，无缄默以自便。”<sup>[1]</sup>卷8《世宗本纪下》，195“唐、虞之圣，犹务兼览博照，乃能成治。正隆专任独见，故取灭亡。”<sup>[1]</sup>卷6《世宗本纪上》，128他对官吏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即是否正直、敢于直谏。有司奏右司郎中卒，他深为惋惜，说“是人甚明正，可用者也。”他晚年曾谓宰臣云：“朕虽年老，闻善不厌。孔子云：‘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大哉言乎。”<sup>[1]</sup>卷8《世宗本纪下》，195章宗时期，奉御完颜阿鲁带使宋北还后，奏报韩侂胄市马厉兵，将谋北侵，章宗闻之大怒，“笞之五十，出为彰州府判官”，后来淮平陷落，证明完颜阿鲁带所言不虚，章宗马上将之提升为安国军节度副使。并且“喻尚书省，士庶陈言皆从所司以闻，自今可悉令诣阙，量与食有，仍给官舍居之，其言切直及系利害重者，并三日内奏闻”<sup>[1]</sup>卷11《章宗本纪三》，261。以此鼓励忠言直谏，为广纳善言创造了条件。

其三，选贤任能。儒家哲学重视执政者的道德水平和执政水平，所谓“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sup>[1]</sup>《孟子·公孙丑上》。“强国荣辱在于取相。”<sup>[1]</sup>《荀子·王霸》在金统治前期，统治者将辽宋人才，吸收到自己的统治阶层队伍中并委以重用，实现了初期政治统治的平稳建立和巩固。金代中期诸帝王皆求贤若渴，金世宗提出著名的“好儒恶吏”主张，他说“儒者操行清洁，非礼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幼为吏，习其贪墨，至于为官，习性不能迁改，政道兴废，实由于此。”<sup>[1]</sup>卷8《世宗本纪下》，185他还多次强调，“天下至大，岂得无人，荐举人材，当今急务也”<sup>[1]</sup>卷8《世宗本纪下》，193。章宗在位时主张不拘一格任用人才，举贤不避亲。他对宰臣说“自今内外官有阙，有才能可任者，虽资历未及，亦具以闻，虽亲故，毋有所

避”<sup>[1]</sup>卷11《章宗本纪三》，247。在人才的使用上，世宗提倡任用“实材”，他说“海陵不辨人才优劣，惟徇己欲，多所升擢。朕即位以来，以此为戒，止取实才用之”<sup>[1]</sup>卷6《世宗本纪上》，140。对人才的取舍，他主张“咸试以事”，他认为“凡人言辞，一得一失，贤者不免”，他还主张用人“不以独见为是”，“众所共与者用之”<sup>[1]</sup>卷7《世宗本纪下》，176。章宗也提倡真才实学。他说“凡称政有异迹者，谓其断事有秩才也。若只清廉，此乃本分，以贪污者多，故显其异而。”<sup>[1]</sup>卷10《章宗本纪二》，227

其四，崇俭去奢。在儒家哲学中，节俭对个人而言是必备品德。对国家而言，是富国裕民的重要手段，所谓“政在节财”<sup>[1]</sup>《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节俭还是统治者爱民的重要表现，所谓“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sup>[1]</sup>《论语·述而》。金世宗为政强调“务为纯俭”。他说“朕于宫室惟恐过度，其或兴修，即损宫人岁费以充之，今亦不复营建矣”<sup>[1]</sup>卷6《世宗本纪上》，141。皇统元年，世宗将“如中都”，诏中都转运使曰：“凡宫殿张设毋得增置，无役一夫以扰百姓，但谨围禁、严出入而已。”<sup>[1]</sup>卷6《世宗本纪上》，124章宗承继大统后，居安思危，诏谕宰臣“何以使民弃末而务本，以广储蓄”。泰和二年，章宗曾谕有司曰：“金井捺钵不过二三日留，朕之所止，一凉厦足矣。若加修治，徒费人力。其藩篱不急之处，用围幕可也。”“又敕御史台，京师拜庙及巡幸所过州县，止令洒扫，不得以黄土覆道，违者纠之”<sup>[1]</sup>卷11《章宗本纪三》，258。崇尚节俭、节用爱民成为章宗朝一以贯之的原则。户部尚书邓俨等说“用度有节，著积自广矣”<sup>[1]</sup>卷9《章宗本纪一》，215。

## 二、女真教育与科举以儒学为主要内容

与契丹人不同，金女真人非常重视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在教育方面，他们设立了专门的女真学校，在科举方面，他们针对女真人设立了专门的考试科目，其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

第一，官学教育。金朝实行的是汉学与女真学并行的官学教育体制。大定十三年，金世宗下诏“始设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以新进士为教授”<sup>[1]</sup>卷51《选举志》，1133-1134。大定二十八年建女真太学，这样金代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女真教育机构。女真官学教育使用的语言是女真大小字，教授的主要内容是以女真字翻译过来的儒家经典，主要有《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列子》以及《新唐书》。所选派的教师皆为“宿儒高才

者”<sup>[1]</sup>卷8《世宗本纪下》，200。其考核的内容与汉生相同，“凡会课，三日作策论一道，季月私试如汉生制。”<sup>[1]</sup>卷51《选举志》，1134显示出了世宗一向倡导的女真民族文化与儒家文化并重的倾向。在金代的官学教育中，女真语言只是一种工具，女真教育的核心内容、实质内容是儒家文化和思想观念，女真人没有自己的书籍和经典文化，接受儒学教育是金女真人的必然选择。

第二，官庭和私学教育。女真统治者对官庭教育非常重视，帝王贵族中许多人有较高的儒学修养。熙宗“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sup>[2]</sup>卷166《金虏节要》，1197，“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sup>[1]</sup>卷4《熙宗本纪》，77。“赋诗染翰，雅歌儒服，烹茶焚香，弈棋象戏。”<sup>[2]</sup>卷166《金虏节要》，1197辽王宗干（海陵王父）听说张用直“少以学行称”，于是延置门下，使教海陵与其兄<sup>[1]</sup>卷105《张用直传》，2314。这样，海陵王自幼“延接儒生”，长大后“嗜习经史，一阅终身不复忘，见江南衣冠文物朝仪位著而慕之”<sup>[3]</sup>卷13《海陵王》，185，187。海陵王即位后，又以张用直为签书徽政院事、太常卿、太子詹事。他对张用直说“朕虽不能博通经史，亦粗有所闻，皆卿平昔辅导之力，太子方就学，宜善导之，朕父子并受卿学，亦儒者之荣也”<sup>[1]</sup>卷105《张用直传》，2314。世宗不仅注重对儒家经典的学习，而且强调必须力行之，学以致用。他说，““经籍之兴，其来久矣，垂教后世，无不尽善。今之学者，既能诵之，必须行之。然知而不能行者多矣，苟不能行，诵之何益”<sup>[1]</sup>卷7《世宗本纪中》，164。大定二年四月，世宗立第二子完颜允恭为皇太子，赐名允迪，告诫他说：“在礼贵嫡，所以立卿。卿友于兄弟，接百官以礼，勿以储位生骄慢。日勉学问，非有召命，不得侍食。”<sup>[1]</sup>卷19《世纪补·显宗本纪》，410允恭“专心学问，与诸儒臣讲义于承华殿。燕闲观书，乙夜忘倦，翼日辄以疑字付儒臣校正”<sup>[1]</sup>卷19《世纪补·显宗本纪》，410。章宗自幼受到儒家伦理文化的熏陶，“属文为学，崇尚儒雅，故一时名士辈出”<sup>[4]</sup>卷12，136。

金代的官庭教育还包括侍卫教育。世宗说“且教化之行，当自贵近始”<sup>[1]</sup>卷7《世宗本纪中》，160。他规定侍卫亲军也要学习用女真字翻译的儒家典籍。大定二十三年，“以女直字《孝经》千部付点检司分赐护卫亲军”<sup>[1]</sup>卷8《世宗本纪下》，184。章宗即位后诏“其护卫、符宝、奉御、奉职、侍直近密，当选有德行学问之人为之教授”<sup>[1]</sup>卷9《章宗本纪一》，210。统领亲军的点检司专设教授若干名进行文化教育。泰和年间，“诏亲军三十五岁以下令习《孝经》、《论

语》”<sup>[1]</sup>卷12《章宗本纪四》，270。金廷重视近身侍卫礼仪道德教育的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是，金廷多次发生宫廷政变的历史事实促使统治者对侍卫的问题格外重视，从他们对侍卫的儒学教化来看，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已被视为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有力武器。

女真上流社会和富有家庭还延请老师设私学教授其弟子。江南名士朱弁滞留金达十四年之久，金国名王弟子多遣子弟就学<sup>[5]</sup>卷373《朱弁传》，11559。完颜希尹延请洪皓教授其子孙。由此可见，在女真人中，尤其是女真上流社会学习儒家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风尚。

第三，女真进士科与经童科。金代专为女真人设立了策论进士又称女真进士的科举考试科目，以选拔女真人才。考试内容包括策、诗。与女真进士科同时创立的还有女真经童科，是为选拔优秀的女真少年儿童所设的科目。大定十三年，金代在京师举行了首科女真进士考试。“策”的题目是“贤生于世，世资于贤。世未尝不生贤，贤未尝不辅世。盖世非无贤，惟用兴否，若伊尹之佐成汤，傅说之辅高宗，吕望之遇文王，皆起耕筑渔钓之间，而其功业卓然，后世不能企及者，盖殷、周之君能用其人，尽其才也。本朝以神武定天下，圣上以文德绥海内，文武并用，言小善而必从事，事小便而不弃，盖取人之道尽矣。而尚优贤能遗于草泽者，今欲尽得天下之贤而用之，又俾贤者各尽其能，以何道而臻比乎？”<sup>[1]</sup>卷51《选举志》，1141在这一科考试中，中选者有徒单镒以下二十七人。此后至哀宗正大七年，金代共举行了20科的女真进士科的考试。在科举考试中中选的女真进士往往得到优厚的政治待遇，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女真人重要的晋身之阶，这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促进女真人学习儒家文化的积极性，使女真人的整体儒学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 三、女真人伦理观念的儒学转化

大定二十三年九月，当译经所进所译经书时，世宗谓宰臣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sup>[1]</sup>卷8《世宗本纪下》，184章宗一以贯之，重视道德践履成为金朝历代帝王倡导儒学的重要内容。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经过长时间的女真儒学教育，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被女真人学习和吸收，并转化到具体的行动中，女真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发生了较明显的儒学化转变。

首先，孝道观念。“孝”在儒家文化中是为仁之

本的概念,“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sup>〔1〕</sup>《论语·学而》。金人对“孝”道非常重视,他们以女真文翻译的第一批儒家经典中就有《孝经》,多数的儒家学者和帝王都对孝道有所论述。世宗皇帝说:“惟忠惟孝,匡救辅益,期致太平。”<sup>〔1〕</sup>卷88《乾石烈良弼传》,1951 他训诫皇太子及亲王说,“人之行,莫大于孝弟。孝弟无不蒙天日之祐。汝等宜尽孝于父母,友于兄弟”<sup>〔1〕</sup>卷7《世宗本纪中》,161。金统治者以孝道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章宗说“孝义之人素行已备,稍可用即当用之,后虽有希覬作伪者,然伪为孝义,犹不失为善,可检勘前后所申孝义之人,如有可用者,可具以闻”<sup>〔1〕</sup>卷9《章宗本纪一》,220。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金代涌现了大量的孝子和孝行,如女真人温迪罕翰鲁补年十五丧父,“庐于墓侧。母疾,割股肉疗之”<sup>〔1〕</sup>卷127《温迪罕翰鲁补》,2746。

其次,忠义观念。《孝经》将人本有的对父母的孝心与忠君联系起来,所谓“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sup>〔1〕</sup>《孝经·广扬名》。《忠经·天地神明》有云:“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动神明,而况人乎?忠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其行一也。”金代统治者对孝道的提倡,一方面为了移风易俗,在全社会形成优良的道德风尚,一方面是因为看重孝所具有的这种“移孝作忠”的政治教化功能。世宗亲赐侍卫《孝经》,就是为了使他们先知孝顺父母,然后知忠于君主。他对忠义之士表现出了极大的赞赏,说“朕观前代人臣将谏于朝,与父母妻子诀,示以必死。同列目视其死,亦不顾身,又为之谏。此尽忠于国者,人所难能也”<sup>〔1〕</sup>卷7《世宗本纪中》,172。哀宗在蒙古兵围城时面谕群臣,“纵死王事,不失为忠孝之鬼”<sup>〔1〕</sup>卷18《哀宗本纪下》,401。《金史·忠义传》记载,金末死于王事、尽忠国家的女真义士43人。如,术甲法心,蓟州猛安人,官至北京副留守。贞祐二年守密云县。家属被蒙古兵俘获,蒙古兵指其家属相要挟,法心说:“吾事本朝受厚恩,战则速哉,终不能降也,岂以家人死生为计耶。”城破,死于阵<sup>〔1〕</sup>卷121《忠义一》,2654。泰和三年进士完颜仲德,有文武之才。哀宗迁蔡,仲德带兵赴国难,死守孤城,城破壮烈殉国<sup>〔1〕</sup>卷119《完颜仲德传》,2610。

再次,贞节观念。自北宋中期以后,宋代的理学家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南宋朱熹将“夫为妻纲”列为“三纲”之首,“贞节”成为儒家乃至全社会衡量妇女道德水平的最重要标准。金初没有明显的贞节观念。女真人流行收继婚遗风,“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后来经过长期的儒家文化教育和熏陶,女真妇女也有了较强的贞节观念。金晚期,国势衰败,战争频繁,涌现出

了一大批贞节烈女,《金史·烈女传》载:撒合鞑留守中京,大兵围之,其妻“独吉氏度城必破”,“乃取平日衣服米庄具玩好布之卧塌,资货悉散之家人,艳妆盛服过于平日,且戒女使曰:‘我死则扶置榻上,以衾覆面,四围举火焚之,无使兵见吾面’”,撒合鞑知夫人死,说“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庭乎?”遂死战,不果,投水死。

完颜长乐之妻蒲察氏,逢崔立之变,“驱纵官妻子于省中,人自阅之”,“蒲察氏闻,以幼子付婢仆”,“与家人诀曰:‘崔立不道,强人妻女,兵在城下,吾何所逃,惟一死不负吾夫耳’”,“遂自缢而死,欣然若不以为死为难者”。

陀满胡土门之妻乌古论氏,逢“崔立之变,衣冠家妇女多为所污,乌古论氏谓家人曰:‘吾夫不辱朝庭,吾敢辱吾兄及吾夫乎。’即自缢,一婢从死”<sup>〔1〕</sup>以上均见卷130《烈女传》,2800—2803。

女真人对孝道、忠义、贞节观念的重视和践行,与本民族文化传统影响是分不开的。“女直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sup>〔1〕</sup>卷7《世宗本纪中》,164。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文化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教化作用。世宗昭德皇后乌林答氏为使自身不受海陵王侮辱,也为了葛王(即世宗)免遭戕害,自杀身死<sup>〔1〕</sup>卷64《后妃传》,1521—1522。遗书中多有“女之事夫,其心惟一”,“贞女不更二夫”之言,又云“妾幼读诗书,颇知义命”,“妾之死为纲常计”,“为后世为臣不忠为妇不节之功也”<sup>〔6〕</sup>卷50《上世宗书》,734。明确表示了自己受儒家文化教育多年,严守贞节的决心。完颜承晖在中都陷落饮药自杀之前曾说:“承晖于《五经》皆经师授,谨守而力行之,不为虚文。”<sup>〔1〕</sup>卷101《承晖传》,2227

#### 四、女真人与儒学研究

经过长期的女真儒学教育和儒家文化的浸染和熏陶,在女真人中出现了一批习儒通经、雅好儒学之士。完颜弼,护卫出身,宣宗朝累官知东平府事。“生平无所好,惟喜读书,闲暇延引儒士,歌咏投壶以为常。”<sup>〔1〕</sup>卷102《完颜弼传》,2255 金末名将完颜陈和尚,初补护卫亲军,“雅好文史,自居侍卫日,已有秀才之目”,“在军中从经历官王渥受《孝经》、《论语》、《春秋左氏传》,尽通其义”<sup>〔1〕</sup>卷123《忠义传》,2680。纳邻猛安虎遯,“虽贵家,刻苦为诗如寒士,喜与士大夫游。裴满亨,大定年间收充奉职”,“性敦敏习儒”,世宗鼓励他“其勿忘为学也”<sup>〔1〕</sup>卷97《裴满亨传》,2143,大定二十八年中进士。完颜仲

德,“少颖悟不群,读书习策论,有文武材。初补亲卫军,虽备宿卫而学业不辍,中泰和三年进士第”,居官后“虽在军旅,手不释卷”<sup>[1]</sup>卷119《完颜仲德传》,2605。

在这些爱好儒家文化的女真人中徒单镒的成绩比较突出,他“明敏方正,学问该贯,一时名士皆出其门,多至卿相”。他“尝叹文士委顿,虽巧拙不同,要以仁义道德为本,乃著《学之急》、《道之要》二篇,太学诸生刻之于石,有《弘道集》六卷”<sup>[1]</sup>卷99《徒单镒传》,2191。《金史》本传中,大段记载了徒单镒的上疏,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儒学思考。他说,“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父义、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谓之五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兴,缙绅学古之士弃礼义,忘廉耻,细民违道畔义,迷不知返,背毁天常,骨肉相残,动伤和气,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薄俗,顺人心,父子夫妇,各得其道,然后和气普洽,福祿荐臻焉。”关于“为政之术”,他提出“其急有二”。一是正臣下之心,二是导学者之志。关于正臣下之心。他说,“穷见群下不明礼义,趋利者众,何以责小民之从化哉。其用人也,德器为上。才美为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虽有才能,行义无取者,抑而下之,则臣下之趋向正矣。”关于导学者之志。他说,“教化之行,兴于学校。今学者失其本真,经史雅奥,委而不习,藻饰虚词,钩取禄利,乞令取士兼问经史故实,使学者皆守经学,不惑於近习之靡,则善矣”<sup>[1]</sup>卷99《徒单镒传》,2187-2188。女真状元奥屯忠孝担任滑州长官时,曾自注《孝经》,刊印后发给郡内乡民,他说“王道之基,莫先教化;教化之源,始于学校,学校不立,何以化人。”<sup>[7]</sup>中册《滑州重修学记》第2132

有些人虽然没有著书立说,但对儒家思想的

研习把握也比较深入。完颜匡任显宗侍读时,寝殿小底驼满九住问他如何评价伯夷叔齐。完颜匡说,“孔子称夷、齐求仁得仁。”九住说“汝辈学古,惟前言是信。夷、齐轻去其亲,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仁者固如是乎?”完颜匡回答他说,“不然,古之贤者行其义也,行其道也。伯夷思成其父之志以去其国,叔齐不苟从父之志亦去其国。武王伐纣,夷、齐叩马而谏。纣死,殷为周,夷、齐不食周粟遂饿而死。正君臣之分,为天下后世虑至远也,非仁而能若是乎?”世宗曾从修身的角度论及中庸思想,“凡修身者喜怒不可太极,怒极则心劳,喜极则气散,得中甚难,是故节其喜怒,以思安身。”<sup>[1]</sup>卷8《世宗本纪下》,202 章宗也曾说过“时事殊,得中为当”<sup>[1]</sup>卷9《帝宗本纪上》,212 从为政角度对中庸有所阐述。

总体来看,女真人对儒学的学术研究还停留在比较浅的层面。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为儒学应用而作,而不是做深入的学术上的探讨,他们对儒家思想本身的思考,主要集中于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道德层面,对于形上层层面和本体层面、心性层面的内容甚少涉及。

### [参考文献]

- [1] 脱脱,等. 金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 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3] 宇文懋昭. 大金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4] 刘祁. 归潜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 脱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6] 张金吾. 金文最[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7] 阎凤吾. 全辽金文[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 Nüzhen in Jing Dynasty and Confucian Thought

LIU Hui<sup>1,2</sup>

(1. Research Center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136000, 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 Jilin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ngchun 130033,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Jing Kingdom, Confucianism was stipulated as the national ideology, and Confucianism was the rulers' guiding ideology. Both the education of Nüzhen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Jing Dynasty took Confucianism as the main contents, and therefore the Nüzhen ethics had obvious Confucian tendency. However, Nüzhen's academic research of Confucianism just stayed in junior level. Their thought of Confucianism mainly concentrates on eth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political and moral level, but as for the ideological level and ontological level and psychological level little attention had been paid.

**Key words:** Jing Dynasty; Nüzhen; Confucian Culture

[责任编辑:赵红]